

# 新移民女作家的“黄白性恋”书写

——以《扶桑》和《K:英国情人》为例

汪杨静

**内容提要**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用汉语写作的新移民女作家笔下有一个相似主题,即对跨越种族的“黄白性恋”的书写,尤其是黄人女性和白人男性的恋情。严歌苓的《扶桑》和虹影的《K:英国情人》为其中典型案例,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可分析这两个“黄白性恋”文本叙事线索的同构和意识形态的博弈。两个文本以异国想象和“自我东方化”书写为序曲,白人男性在故事开端以种族优越性压倒黄人女性,经过欲望写照和性恋博弈,黄白之间的权力关系倒置,随着对母文化的认同和乌托邦环境的设定,黄白双方的权力达到平衡,最后黄白恋分手的结局揭示了种族意识和文化差异是跨种族恋情的巨大阻碍。新移民女作家借“黄白性恋”书写表达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表面顺服之下,实则积极借用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建构属于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主体。

**关键词** 黄白性恋 新移民女作家 后殖民主义 《扶桑》 《K:英国情人》

DOI:10.16228/j.issn1008-0163.2024.02.014

## 一、“黄白性恋”的界定及书写传统

“新移民文学”指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sup>①</sup>新移民女作家,作为其中特殊的群体,身处多重文化的夹缝,对自己的“边缘”地位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一方面作为少数族裔,她们是白人主流社会的他者;一方面作为女性,她们又是男权社会的他者。这一处境使得许多新移民女作家普遍比男作家更易产生身份危机,促使她们通过创作来表达自身在族裔、文化、性别认同中寻找自我、确认自我的心路历程。如严歌苓、虹影、张翎、林湄、陈谦、陈霆、吕红、施雨等,既想要在西方世界站稳脚跟,又不愿丢失自身文化之根,她们的作品,都将跨越种族的异国恋情作为一种沟通中西

方文化的纽带,书写在“东方/西方”这一参照体系中不同种族男女之间的“黄白性恋”。

“黄白性恋”这一概念,是由吴卫华和镇涛在《意识形态话语的隐形书写——好莱坞电影的黄白性恋模式》一文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将好莱坞电影中有关中国背景题材的中西跨文化恋情故事界定为“黄白性恋”。本文之所以采用“黄白性恋”意在:(1)用“黄白”这个鲜明的肤色差异来突出背后深刻的种族意识,1982 年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提出术语“色彩歧视”(colorism),来反映“人们基于肤色对不同种族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的歧视和区别对待”,<sup>②</sup>笔者采用色彩来定义黄白双方的恋情关系,目的是为了表达在双方恋情开始之前,二者的权力关系就已经存在文化层面的等级预设;(2)将“性”与“恋”结合在一起,体现出黄白恋情故事中欲望和猎奇的因素占有很大比重。

西方文学作品中对“黄白性恋”的书写,与西

方和东方之间的历史交往和政治力量对比有很大干系,西方对东方的态度经历了不同的转变期。16世纪之前,东方于西方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地理概念,西方将黄色人种定义为鞑靼人(Tartars),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的差别而对其有所排斥,但由于距离原因,双方之间无太多交集,只有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极少探险家向西方传述东方见闻。到了17、18世纪,一批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游历,将中国的开明富足传回欧洲,正为革命阴影笼罩的欧洲将东方塑造成一个政通人和的乌托邦形象,很多作家用中国神话来表明他们的政治理想。而笔者找到的最早的“黄白性恋”故事是著名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1710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蒂斯·德拉克鲁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在撰写成吉思汗的第一本传记时,出版了一部关于亚洲文学题材的寓言故事,其中就有蒙古公主图兰朵招西方骏马的故事,故事中强大的东方王国被西方作为崇敬的典范,50年后,意大利剧作家卡洛·戈奇(Carlo Gozzi)创作了最早的《图兰朵》剧本。此外,同时期的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普(Horace Walpole)在1785年出版了《象形文字的故事》(Hieroglyphic Tales),讲述了一个中国王子拯救西方落难公主的故事,强大的东方形象体现了18世纪西方作家对于中国的他者想象与政治隐喻。18、19世纪之交,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鸦片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在西方面前成了一个蒙受屈辱的形象,曾经西方眼中颂扬的“开明皇帝”“孔教哲人”变成了胆小怯懦的形象。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将他们见识的东方传回欧洲,这一时期的东方在西方笔下是苍白、暗淡、没落的,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sup>③</sup>西方对“黄白性恋”的书写也发生了根本的倒置,西方男性拯救东方女性成为了这一恋情的基本模式,东方形象是阴柔的、弱小的、顺服的,在西方作家笔下,黄人女性几乎是盲目地顺服、疯狂地献身与爱慕白人男性,在约瑟夫·梅里(Joseph Mery)的小说《英国人和中国人》(Anglais et Chinois)和保尔·蒂伏瓦(Paul D'Ivoi)的小说

《中国蝉》(Cigale en Chine)中均有描写。其后,20世纪以来西方作家将“西强中弱”的模式沿袭下来,就算是关于黄男白女的恋情故事,传统男强女弱的男权思想也让位于西强中弱的种族思维,在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L'Amant)和《北方的中国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中,即使书中的中国男性对西方女性施拯救者行为,给予经济援助,但其形象仍低于西方女性。

本文将研究的视点放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用汉语写作的新移民女作家身上,她们的作品中有一个相似的主题,即对于跨越种族的“黄白性恋”的书写,尤其是黄人女性和白人男性的恋情。这样的作品有:严歌苓的《扶桑》《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虹影的《K:英国情人》《岔路上消失的女人》、张翎的《羊》《交错的彼岸》、吕红的《美国情人》、林湄的《天望》、陈谦的《覆水》等。其中,严歌苓的《扶桑》中文版出版于1995年,英文版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于2001年出版,虹影的《K:英国情人》台湾繁体版出版于1999年,简体中文版和英文版K: The Art of Love于2002年出版。这两部作品无论从作家声名、再版情况、国际传播等角度来看都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本文以《扶桑》和《K:英国情人》为例,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对作品进行种族、性别、形象学和意识形态的分析。

## 二、序曲:异国想象和“自我东方化”

在“黄白性恋”故事的开端,书中男女往往并非通过接触来认识对方,在他们相互认识之前,心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对于异国的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是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赋予他们的,在法国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的形象学理论中,这叫作社会集体想象物。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某一特定时期,某一国家、民族、社会对于异国的集体想象,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性表现”,<sup>④</sup>这种想象是潜移默化的,在一代人心目中固定下来,又影响到下一代人,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见解。所有黄白恋情的开端都是以异国想象为序曲的,不论是白人男性对东方的想象,还是黄人女性对

西方的想象,他们在介入一种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价值判断。

严歌苓的《扶桑》写了一个中国妓女和白人男孩的爱情故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在还未相遇之时,就已经对异国有了他们的认知。“东方,光这字眼就足以成为一切神秘的起源,起码在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心里”,<sup>⑤</sup>对于白人男孩克里斯而言,华人是其社会公认的卑贱的民族,他们像蚂蚁一样涌来,包围城市,这些被称作“黄色工蚁的梳辫子的矮小男人们”,<sup>⑥</sup>用忍让一切的黑眼睛、土黄色的脊梁使白人感到恐惧,他们厌恶这些长辫子、抽鸦片的中国佬,想要他们滚出去。而中国女人在克里斯眼里显得较为晦涩——绫罗宫灯、红漆斑驳的门、纸竹子和蜡莲花、一泻而下的黑发、穿红绣鞋的小脚,“他看着那笼格般的窗口,一尊神像般的东方女人”。<sup>⑦</sup>而对扶桑来说,白人男孩克里斯最初“是成千上百的来唐人街妓馆找便宜的小白鬼之一”,<sup>⑧</sup>她不认为他和其他嫖客有什么两样。虹影的小说《K:英国情人》在故事的开端也写了白人裘利安在刚踏上中国土地时,所见所闻与他想象中的异国情调的呼应,一路所见到的中国苦力、大红喜轿、像“瓷娃儿”似的新娘让他觉得新奇,裘利安意识到:“来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或许还可以另有一个结果:艳遇,异国情调,瓷娃儿似的。”<sup>⑨</sup>

所有这些白人男性对于东方的异国想象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形象,这些对于中国器具饰品(木漆柜子、古董玩物、书画扇面、旗袍彩绘)、中国人外形特征(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黄皮肤、长指甲、吊眼睛)和中国人生生活方式(婚丧嫁娶、黄包车夫、鸦片烟馆)的描写,都迎合了一代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代表作《东方学》(*Orientalism*)里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点,自古以来就代表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非凡的经历。”<sup>⑩</sup>黄白恋情故事在互相怀有对陌生国度的判定和好奇之中展开,东方和西方的相遇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在潜意识里西方人

一直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将东方人列为劣等种族,故事开端恋情的双方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扶桑的身份是妓女,且不说她的华人身份,光是这一点就显得她卑微低贱;在《K:英国情人》中,裘利安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材生,是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的“第二代”诗人,他从小生活在中国知识分子大为推崇、趋之若鹜的圈子里,作者的这些设定都给予白人男性一种优越感。

就此而言,黄人女性在故事的开头往往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读者只看到大段从男性视角出发对于异国见闻的描写,而女性并没有太多机会表达自身,她们更多是作为“物”,被男性的目光细细打量和观赏。扶桑作为妓女,最开始是被贩卖到旧金山,像笼中货物一样兜价叫卖的:“一毛钱看一看、两毛钱摸一摸、三毛钱做一做啦!”<sup>⑪</sup>闵作为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最开始在书中的形象,也是借由裘利安的目光来呈现的:“能吸引他注意的女人,只有系主任的妻子……他没法不注意,她不微笑时,只是说得过去,及格而已,但她若微笑起来呢?”<sup>⑫</sup>闵对于裘利安的吸引,与其说是男女之情,不如说她是裘利安初到中国的猎奇对象。

新移民女作家们在故事的开端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开启黄白恋情,这种书写设定,潜在地揭示了她们身处中西文化边缘、不被西方主流社会接纳的文化处境,她们试图利用西方话语获取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因此按照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想象和见解来刻画东方,这种“东方人的东方主义”<sup>⑬</sup>被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称为“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sm)。

### 三、博弈:欲望写照和权力变动

新移民女作家的“自我东方化”,不仅体现在“黄白性恋”初期对白人男性优越性和对东方异国想象的写照上,还体现在对黄白双方的性欲描写上。将东方女性作为欲望客体,是西方男性的一贯态度,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赫尔德(Johann G. Herder)、黑格尔(G. W. F. Hegel)、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明恩溥(Arthur H. Smith)等人都曾提出过将东方视为淫荡和欲望的观点,

福楼拜曾说:“东方女人不过是一部机器,她可以跟一个又一个男人上床,不加选择。”<sup>⑭</sup>罗曼·古鲁斯(Romain Coolus)也曾《逃亡和叙事诗》(*Exodes et Ballades*)中评价过中国女人:“挑选她征求她,仿佛她是唯一,甘做奴婢的女人,卑贱甚而廉价。”<sup>⑮</sup>1898年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John Luther Long)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开启了将东方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模式。由这部小说改编的歌剧《蝴蝶夫人》讲述了一个日本妓女和白人军官的爱情故事,故事中东方女性作为肉体 and 欲望的化身,心甘情愿被西方男性征服,在受到他的抛弃之后仍然不离不弃,养育白人男性的孩子。随着这一叙事的大获成功,类似的黄白恋情故事在此基础上被西方作家创造出来,有写越南女性和白人男性的《西贡小姐》,也有写华人女性和白人男性的《苏丝黄的世界》,这些故事都万变不离其宗地刻画了被白人男性抛弃后仍不离不弃的黄人女性形象。这些黄人女性被标签化为妓女、情妇、玩物、性对象,她们是顺服的、柔弱的、楚楚可怜的,她们身上投射了白人男性的性幻想。这正验证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学自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性领域……它在考察自身及其对象时戴着性别歧视的有色眼镜。这在旅行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sup>⑯</sup>

新移民女作家们深知西方男性对于东方女性的性幻想,因此在黄白恋情的书写中,性爱关系是男女恋情的一个关键词。《K:英国情人》中裘利安和闵的恋情,是随着两人的情欲关系开展和变动的。裘利安是一个不谈感情、想要性自由的登徒子,他最初对于中国女性的兴趣只在猎奇,书中他多次自白:“他知道自己喜欢女人,但并不依恋任何女人。”<sup>⑰</sup>“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和一个东方女人做爱是什么滋味而已。”<sup>⑱</sup>在与闵的接触当中,他率先对闵做出了性暗示,掌握了双方关系中的主动权:到闵家做客时,在闵的丈夫离开后,裘利安大胆地在言语和行为上挑逗闵,闵虽然有反抗,但更多是欲拒还迎,“她只是稍微挣扎了两

下,却没有任何抗议,就无助地被他抱在胸前”。<sup>⑲</sup>在这一场景中:裘利安的主动进攻(白人男性的强势威严)、闵丈夫的形同虚设(华人男性的阴柔去势)、闵的乖乖就范(黄人女性的顺从屈服)都符合西方话语中的黄白恋情设定。但接下来恋情的发展却与西方叙事不同,裘利安在对闵接触后,陷入了相思的忧郁,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对闵产生了爱情,而闵更是主动上门照顾生病的裘利安,与黄人女性一贯的被动地位不同,闵在两人的关系中采取了主动:她写信邀请裘利安寒假与她在北京相见,裘利安接受邀请来到北京,两人正式成为了情人关系。随着两人恋情的深入,黄白双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倒置,在床第之间“闵从羞涩中挣脱出来,变了一个人”,<sup>⑳</sup>她表现得鲜活生动、兴致高昂,反观裘利安在东方古典的神秘面前“仿佛是一个初尝禁果的男孩,他好像从来没有性经验似地笨拙”。<sup>㉑</sup>闵精通道教房中术《玉女经》,在性爱关系中,她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裘利安在她面前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受她指引,完全没有西方男性固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白人男性在这里,变成了黄人女性的欲望客体。裘利安在书中也坦白:“他第一次听到这样明确以女性中心的性理论,性是为了让女人快乐,他怎能抱怨做了女人的工具。”<sup>㉒</sup>恋情发展到这一阶段,黄人女性由被动化为主动,由劣势化为优势,由服从化为掌控,黄白恋情的话语权经由情爱这一载体从白人男性让渡到黄人女性手中。

《扶桑》中,黄白双方的权力关系亦在性恋博弈中变动。扶桑和克里斯初见时,扶桑是个20岁的妓女,克里斯只是个12岁的男孩,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两千多个白种男童向中国妓女求欢,其中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十四。是中国妓女的‘低廉价钱’将白种男孩吸引的。”<sup>㉓</sup>西方社会所公认的华人的卑贱和妓女的廉价,使得白人小孩可以肆无忌惮,12岁的克里斯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热情走进中国妓院的,“和其他白种男童怀有相似的初衷,用买零嘴的钱为自己买个活玩具”。<sup>㉔</sup>在扶桑和克里斯最初的接触中,克里斯将扶桑作为他的新玩具,他不过是一个想要寻欢作乐的小嫖客,“带有侵略性的好奇”<sup>㉕</sup>来看这个东方女人,



以及她身上“新鲜、异样的诱惑”。<sup>②6</sup>但在接触之后,扶桑身上所带的东方魅力使得这个白人男孩迷失了,严歌苓分三条线索描写了黄白双方权力关系的变动。从感情线索来看,克里斯对扶桑经历了“涉猎—倾慕—迷恋”的情感转换,“涉猎热情转换成了倾慕”,<sup>②7</sup>其后又由倾慕慢慢累积成了日思夜想的迷恋。在这个过程中,扶桑在克里斯面前变得高大起来,如同书中所写:“你的卑贱,你民族和你本身被他的民族所公认的卑贱都不能使他勇敢起来了。”<sup>②8</sup>从行为线索来看,克里斯对扶桑发生了“拯救—强奸—赎罪”的行动转换,克里斯对扶桑一直怀有骑士梦想,“想象自己是神话中的骑侠,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管教”,<sup>②9</sup>在扶桑因病被妓院抛弃的时候,克里斯将她接入基督教拯救会,救了扶桑的性命。后来白人因种族歧视火烧唐人街时,克里斯乘乱与其他人强奸了扶桑,两年后敌不过良心鞭挞的克里斯来到拯救会,开学校教育中国人,当他再次与扶桑相遇后,一直在忏悔煎熬的克里斯“不再顾得上体面,索性呜呜地敞开来痛哭”。<sup>③0</sup>从“拯救者/受害者”到“赎罪者/宽容者”,克里斯与扶桑的关系发生了倒置。从身份线索来看,克里斯和扶桑之间有一种“孩子和母亲”的身份隐喻,20岁的扶桑是12岁克里斯的性启蒙导师,她是激发克里斯男子气概的化身,鞭策着克里斯从男孩成长为男人;在克里斯犯错之后,她又以母性的宽容原谅了克里斯。书中多次出现了“孩童和母性”的话语来比喻两人的关系:“他看着心目中这个女人,明白了他投入这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sup>③1</sup>“他跪下,让她的乳房托着他的脸,让他吮吸他早已在她那儿嗅到的那古老、近乎蛮荒的母性。”<sup>③2</sup>“他突然烦恼自己的长大,已长成这样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男子汉。他情愿小回去,比十二岁更小,小到她能揣在她怀里,小得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去吮吸她的乳头。”<sup>③3</sup>在“孩子和母亲”的身份隐喻下,“西强中弱”的话语模式被彻底瓦解。

#### 四、平衡:母文化认同和乌托邦设定

一些学者认为早期的萨义德理论模式,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确立了一种单方面的权力制

约机制,忽视了被殖民者所拥有的主观能动性,与隐秘反抗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后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都会避免用一种单一二元论的方式来解读后殖民作家文本,他们多会重视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作家话语中存在的多面性倾向。以后殖民三剑客之一的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为例,他提出“混杂性”(hybridity)和“文化协商”(culture negotiation)的术语,表达了两种异质文化面对面冲撞时,并非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存在强弱优劣等级的划分,而是“一个复杂的、正在进行的协商过程,旨在呈现历史转型时期出现的文化混杂状态”。<sup>③4</sup>巴巴试图打破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中心/边缘的辩证二元论,代之以矛盾、分裂、双向、模棱两可等动态过程来呈现差异文化的互动与协商。

新移民女作家作为出生在第三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学习了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之后,虽然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东方化”倾向,但来自母文化的血脉与根基是难以移除的,大部分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都想要表达一种对于母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反抗。以扶桑形象为例,她愚蠢献身的中国妓女形象符合西方话语中东方妓女的刻板印象,但在严歌苓的书写中,扶桑并非仅仅如此,而呈现了母性的受难与宽恕,“她依然站立起来,拭净全身的血,她只接受了那事情中的受难,而没接受其中的侮辱。她就那样宽容了人们”。<sup>③5</sup>这里的描述给扶桑镀上一层受难圣母的光华,将中国妓女与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意象结合在一起,是严歌苓巧妙运用的戏拟手法。此外,对于扶桑低贱身份的描写,严歌苓给予了中国内核的阐释:“多么好的女人,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抔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好在于她的低贱;任何自是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那泥土般的真诚的女性。”<sup>③6</sup>将扶桑比作泥土,虽然低下但是真实,土地的广博深厚和人民的勤勉温驯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民族特质,而“扶桑”的名字在中国文化中有太阳升起之意,最早出自《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sup>③7</sup>在这一形象身上,作者注入了东

方文化中生命力的象征,严歌苓虽然借用了西方的刻板形象,但形象背后所蕴含和宣扬的却是东方的价值内核。

除却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捍卫,新移民女作家们还借“黄白性恋”的书写表达了她们对于西方等级观念和种族意识的反拨。如果说以性与猎奇开头的黄白恋情故事,迎合了西方将东方女性作为欲望客体的书写传统,那么接下来从“性”到“恋”的过渡则反映了新移民女作家对于跨种族恋情的期许。按照西方对于黄白恋情的书写传统,在黄白双方发生关系之后,白人男性应该像玩物一样将黄人女性抛弃,而黄人女性不仅不责怪白人男性,还对其痴痴守候。在新移民女作家笔下,这一模式遭到了根本性颠覆。

《K:英国情人》中,裘利安和闵在北京变成情人之后,两人在性方面的和谐使他们的关系达到了融洽。闺房外,闵对于中国文化有各种高见,在菜系、诗画、服装、戏剧、民俗上她都能侃侃而谈,像一个老师一般指点她的西方学生;闺房内,闵对于房中术的运用能够带给裘利安不一样的性体验,裘利安的积极配合亦使闵能够获得满足,两人在这一阶段的性恋博弈中是平等的。此外,北京作为一个“陌生”空间的设置,为黄白之间的平等关系提供了乌托邦性质的场域。在青岛,闵的头衔是“系主任的夫人”,裘利安则是外聘教授,社会身份、家庭背景、工作环境种种限制了两人的交往。在北京,两人远离外界的限制和干扰,不仅生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都无限接近,像是被安置在一座孤岛上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排除了种族、等级、身份、地位、文化差异的干扰,因最原始的性而互相吸引,阴阳相合。这一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情节塑造,体现了新移民女作家对于“黄白性恋”的一种美好期望,即恋情的双方能够脱离一切固化的成见,像原始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平等地站在一起,就像《简·爱》(Jane Eyre)中简对罗切斯特先生说的那段经典台词:“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一同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彼此平等——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sup>③</sup>

无独有偶,严歌苓在《扶桑》当中也表露出这

种期望。严歌苓塑造了一个白人男孩的形象,克里斯在初遇扶桑时只有12岁,他年轻思想和灵魂没有被社会成见所浸染,尽管他潜意识中也有种族分别,但儿童的身份使他还没有来得及理解他所在的社会对于黄人的仇恨就已经爱上了扶桑。在书写12岁的克里斯对扶桑的感情时,严歌苓多次运用了与原始、质朴和动物相关的语言来形容:扶桑口中的话语“成了一种人类语言之前的表白”,扶桑的黑发“黑得如同原始一样难以看透”,扶桑“撮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扶桑的小脚“是一种在退化和进化之间的肢体,像是鱼类的尾部”。<sup>④</sup>这些语句背后表达了克里斯对扶桑的感情是一种原始的对于生命本能的欲望,这是一个未开化的白人儿童对于黄人女性的爱,是一种古老的、陈腐的倾慕,如同“世上所有男童对成熟美丽女子的倾慕”。<sup>⑤</sup>14岁的克里斯再次遇见扶桑时,心中对她仍是少年的纯洁感情,他常常在想象中与扶桑交谈,“天真纯朴得如同鸟兽的语言,如先民的符号语言,亚当和夏娃的语言一定如此纯朴”。<sup>⑥</sup>在这种最原始的、生命本初的吸引力当中,克里斯和扶桑是平等的,像伊甸园中的人类始祖一样,一切的约定俗成、社会规范、高低贵贱都没有产生,他们之间不是嫖客与妓女,不是白人和黄人,不是高贵与低劣,而是基于本能情愫和纯粹吸引的平等交往,严歌苓将它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书写下来,她期许:“假如人类把十四岁的爱当真,假如人类容忍十四岁的人去爱和实现爱,人类永远不会世故起来。”<sup>⑦</sup>

## 五、结局:种族傲慢和文化差异

不论是让人忘记社会地位、身份限制的乌托邦环境设定,还是未被开化、没被种族意识浸染的儿童形象塑造,都体现了新移民女作家渴求排除社会偏见和等级意识,塑造地位平等的黄白恋情的愿望。虽然怀着这种美好理想,女作家们并没有一厢情愿地将黄白恋情故事设定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肤浅童话,究其原因,种族意识和文化差异作为漫长世纪以来横亘在两种肤色民族之间的鸿沟,不是那么容易填平的,不论历史经

验、时代环境或是作家的自身经历都表明,差异肤色之间的结合注定曲折。

在殖民时代的美国、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政府基于对种族的限制,都出台过反对异族结合和通婚的相关法律法规。美国有1924年弗吉尼亚州的《种族诚信法》(*Racial Integrity Act*),这是殖民地时代白人与黑人之间契约关系的遗留物;纳粹德国有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种高贵论,以此迫害犹太民族,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Laws*)严令禁止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婚外关系;1949年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出台《禁止混合婚姻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为了确保少数人口的白人在南非政治、经济和社会当中处于主导地位。历史上对于异族婚姻的禁令使得不同肤色人种的结合被社会和法律所不容,他们要么被当作丑闻,要么被处以重罪,如同美国著名法学教授雷切尔·莫兰(Rachel F. Moran)在《种族间的亲密关系:种族与浪漫的规则》(*Interracial Intimacy: The Regulation of Race and Romance*)一书中所说的:“种族歧视法律确立了种族吸引力是病态的、越轨的、不自然的和违背本性的……法规将异族婚姻描述为不合适的,甚至是损害社会秩序的。”<sup>⑬</sup>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异族通婚是1614年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和一个英国烟草种植者的婚姻,婚后该印第安女性在英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们的结合作为和平的象征,体现了英格兰在新大陆传播“文明”的典范,同时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筹集殖民地资金的一种方式。殖民地领导者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担心异族恋情会造成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契约的破坏,在1661年至1725年间,美国大部分殖民地以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为代表,出台了禁止异族通婚的法令。历史上最早的黄白婚姻记录,则是在18世纪的欧洲,1713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的黄嘉略(Arcadio Huang)与一位名叫玛丽·克劳德·雷格尼尔(Marie-Claude Regnier)的巴黎中产阶级妇女结婚,在当时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婚姻记录很少,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外交官与印度

地方官员的孙女成亲,他们的婚姻由于宗教和帝国主义因素,在加尔各答引起了公众的愤慨,成为当时的禁忌和丑闻。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异族婚恋的限制,原因不外出于以下几点:“种族纯洁”和“白人至上主义”的维持、殖民统治的需要和经济掠夺的便利、宗教因素的限制和文化差异的难融、民众对异族结合的抵触心理。这几个因素作为种族意识的内核,深刻影响了异族男女间的交往和感情,在“黄白性恋”故事中,黄白双方也多因为种族傲慢和文化差异而分手。

《K:英国情人》中,裘利安和闵的第一次争执就是文化差异引起的,两人看庄周试妻的戏剧时,裘利安不理解故事情节,评论道:“观众的道德标准怎么混乱到这程度,寡妇调情也欣赏,寡妇自杀也认为应该。”闵回答:“只有道德,戏还怎么演?只有调情,不就翻了天?”<sup>⑭</sup>道德、调情这两个词都戳穿了闵的心事,两人属于婚外情,若只讲道德,两人不应该结合;若只讲调情,闵却难以像裘利安一样鼓吹性自由,甚至支持性乱交。这就是他们之间感情生变的最大原因,从小生活在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的裘利安习得了父辈们的性自由传统,将不婚、性自由、不谈感情作为常态,而出生在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闵,虽然也受过西式教育,但她骨子里还是希望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以婚姻形式确定下来,在她向裘利安提出婚姻的时候,裘利安退缩了。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远,尽管裘利安多次向闵表白爱她,但他却始终不能接受闵的方式,他害怕接受闵的爱,最终两人的私情被拆穿,裘利安离开了中国。在离开中国的轮船上,裘利安终于想明白他和闵无疾而终的原因:“在那个致命的上午,她的眼光就把他看穿: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在闵和郑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sup>⑮</sup>虹影以黄白双方之间种族、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作为“黄白性恋”的结局,虽然充满了无奈,但也印证了种族主义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

《扶桑》中黄白双方也因文化差异和难以理解而分手,克里斯一直以他认为的方式来拯救扶



桑,但他从来没想过他的方式到底适不适合扶桑。他一度将扶桑接入基督教拯救会,可后来他发现一身白麻布袍的扶桑没有了妓女的红绸衫,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克里斯也会对她感到陌生。克里斯曾试图像个骑士一样将扶桑带走,但他一直以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对扶桑而言什么是自由,因此他失败了。少年克里斯对于黄色人种的不理解使他几乎精神失衡,在懊恼中他开始憎恨:“他希望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毁灭,毁了这奇形怪状的东方楼阁,毁了所有奇形怪状的辫子和脚,毁掉一切费解的晦涩。”<sup>④⑥</sup>关于黄白两个种族的难以理解,作者参与叙事,以“第三者的声音”到故事中现身说法,描述过她和她的白人丈夫之间的交往:“我对白种人的猜测常有误会,漫说是你那时代的白种少年,就是和这位做了我丈夫的白种人,我也常常因为对他的判断错误而引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对话……正如我丈夫在我的‘yes’里从来听不出那个实实在在的‘no’。”<sup>④⑦</sup>黄白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和难解造成了扶桑与克里斯的分手结局,在小说的结尾“克里斯认识到他从来、从来也没懂过扶桑”,<sup>④⑧</sup>黄白恋情以一方对另一方的不理解告终。

## 六、构建审美主体和呼唤文化协商

纵观《扶桑》和《K:英国情人》两个文本,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黄白性恋”故事的叙事线索具有相似性与同构性。二者都是以异国想象作为开场,两种肤色的男女带着所处社会的成见遇到了对方,在恋情的起始阶段,白人男性有一种先天的优势地位,并且将东方女性作为猎奇对象和欲望客体。随着恋情的深入发展,黄白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置换,黄人女性或因才华见识、或因母性气质将白人男性征服,在她们面前白人男性像小孩一样失去了他高高在上的种族傲慢。在下一阶段,新移民女作家们怀着期许设置了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情节,黄白双方要么处在一个无人认识、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环境中,要么白人男性因年纪尚小而未被西方社会的种族意识所浸染,此时黄白之间的权力关系达到了平衡,两人能够地位平等地进行交往。在故事的结尾,两位新移民女作

家都不约而同地以分手来设定黄白恋情的结局,揭示种族意识和文化差异是跨种族恋情的巨大阻碍。

虽然披着恋情的外套,但新移民女作家的“黄白性恋”书写背后带有她们这一群体的意识形态诉求。这一批作家大多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生在中国,在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随着80年代的出国浪潮纷纷散布在世界的各个主要国家,她们或是旅居或是定居,在异国他乡扎根、结婚生子、更换国籍。她们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引带,以异国生活为凭据,以故国相思为依托,将东西方文化生活的碰撞和交融用文字记录在笔端。作为移民作家,她们身上带有母国(东方)和异国(西方)两种文化的特质,她们的书写也会在东西两种文化场域之间游移。一方面,她们想要尽快融入西方社会,因此利用西方主流话语来进行“自我东方化”的创作;另一方面,她们也积极反抗西方话语霸权,试图建构新移民作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主体性,赢得华人在西方文学市场的话语地位。

母国文化作为新移民女作家们难以割舍的文化根基,不仅是抚慰异乡漂泊主体的精神慰藉,也是抵抗西方话语霸权的有力凭借,通过对母文化的弘扬与认同,新移民女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她们的意识形态归属和文化价值取向。以《扶桑》为例,严歌苓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华人男性形象——大勇,与白人男孩克里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勇这一形象直接打破了华人男性阴柔去势的固化思维,他被塑造成一个威武雄壮、充满生命力、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人物。作为一个叛逆者,他光明正大地违反美国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其嫉恶如仇和狠绝如麻的秉性契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绿林好汉”的特征。尽管他不遵守美国社会规范,但其对于中国人道德伦常和家庭观念的维护,都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审美标准。小说结尾,情节显示大勇正是扶桑跨越大洋前来寻找的丈夫,而他为了维护妻子的声名,在具有美国社会象征的剧院公开杀死侮辱扶桑为“中国婊子”的美国大亨,作者以华人力量的写照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胜利。反观白人男孩克里斯,他从一出场就带着



稚嫩脆弱的孩子气,因爱而不得就想到报复和毁灭,在强暴了扶桑之后选择了远走英国作为逃避,他一直以孩童的面目来伪装自己,借用孩子的名目作为逃脱惩罚的借口,“克里斯想,做一个孩子是多么安全的事。任何罪过到孩子身上都成了过失,再大的过失都可以被理解成过火的顽皮,抑或是恶作剧”。<sup>④</sup>缺乏成熟和担当的克里斯是作者对于西方白人男性以自我为中心、脆弱的种族骄傲的讽刺,扶桑在故事的结尾选择了华人大勇而非白人克里斯,是严歌苓释放的中华民族尊严和自豪感,来抵抗西方白人中心论的种族和文化偏见。如学者费勇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一文中说的:“对研究者而言,与其将注意力过分地置于海外华人对于文化传统的保留之上,倒不如更多地探究海外华人在应付异质环境时如何创造性地运用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智慧去化解、协调、平衡各种冲突、危机等等。”<sup>⑤</sup>

新移民女作家借“黄白性恋”的书写,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她们对东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偏见的反拨,散发出对东西两种文化在冲突中协商的呼唤。如果两个民族能够摒弃“傲慢与偏见”,在人类共有的生命形式和情感体验中相互携手,是可以打破种族、性别、地域、文化的桎梏而和谐共处的。不少新移民女作家,如严歌苓、虹影、周励、聂华苓、融融等,在现实的婚姻生活中也选择了与白人男性结合,她们身体力行,以自身经验告诉世人“黄白性恋”可以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促进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随着21世纪东西之间交往日深,黄白恋情在社会生活中也普及日广,从这些新移民女作家的文本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教益,来应对这个种族、性别、地域限制越来越模糊、流动性和开放性日益增强

的多元世界。

- ①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4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638页。
- ②Trina Jones, “Shades of Brown: The Law of Skin Color”, *Duke Law Journal*, 49(1999), pp.1489-1490.
- ③⑬[法]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46页。
- ④[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 ⑤⑥⑦⑧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严歌苓:《扶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64、53、14、4、14、53、10、11、15、15、55、242、100、134、240、244、135、13、15、97、98、192、62、262、222页。
-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虹影:《K:英国情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13、16、40、35、80、82、89、105、225页。
- ⑩⑪⑫[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42、264页。
- ⑬[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 ⑭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3.
- 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页。
- ⑯[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页。
- ⑰Rachel F. Moran, *Interracial Intimacy: The Regulation of Race and Rom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61.
- ⑱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汪杨静,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邓 媛〕